

北宋邵雍对“体用”的阐释及其主要特点

何南骏, 吴小丽*

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8日

摘要

学术界对北宋邵雍思想研究的颇多, 但对邵雍的“体用”思想的阐释及主要特点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邵雍借助对“体用”的阐释来构建其象数体系, 其体用言说属于对现象世界的描绘。邵雍对“体”与“用”这一对范畴的阐释, 不同于程朱理学式的有体生生哲学, 而是更加贴合万物本身。此外, 邵雍“体”与“用”的思想, 也借鉴了邵古声音之学的“全数”“用数”的概念。通过探讨邵雍是如何运用体用这一对范畴, 去解析万物的构成并使其成为“观物”的哲学方法, 可以更好地理解邵雍思想的全貌及其对理学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邵雍, 体用论, 体四用三, 体用对待

An Interpretation of “Ti-Yong” by Shao Yo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Its Main Features

Nanjun He, Xiaoli Wu*

Institute of Yangmingology and Qian Studies, Guiyang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il 12, 2026; accepted: May 4, 2026; published: May 1184, 2026

Abstract

Extensiv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philosophy of Shao Yong, a prominent thinker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owever, there remains considerable space for further inquiry into his interpretation of “ti-yong” (substance and function) and its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Shao Yong

*通讯作者。

structured his cosmological system of images and numbers through his exposition of “ti-yong”, and his accounts of this conceptual pair center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His understanding of “ti-yong” differs from the Cheng-Zhu Neo-Confucian view that “substance engenders function”, instead anchoring the concept in the inherent nature of all things. Furthermore, Shao Yong’s thought on “ti-yong” also draws upon the ideas of “primordial number” and “manifested number” from his studies of ancient phonology. By examining how he employed the “ti-yong” binary to analyze the constitution of all beings and developed it into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 of “observing things”, we can attain a mor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Shao Yong’s philosophical system as a whol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Keywords

Shao Yong, Theory of Ti-Yong, Four Substances and Three Functions, Antithetical Relation of Ti and Yo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邵雍(1012~1077)作为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以“观物”和“易学”思想著称,并以体用论为核心贯穿其中。近年来,学界已从象数、历史等多维度进行深入研究,并呈现出一种整合性的趋势。如张恒认为:“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大都倾向于从形下视角看待邵雍的体用论。”[1]邵雍的体用论聚焦于经验世界本身的结构与关系,呈现出重“用”的现象。赵恒法在其著作中提到:“邵雍在其象数实践中的体用关系贯彻了他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的基本思想。”[2]强调变者为用,化者为体。李震认为:“与哲学史上常见的体用论体系相比,邵雍的体用论在概念名义、思想内涵与问题意识上都有较大的不同。”[3]邵雍体用论与传统体用论的显著特质,在于其独特的“体四用三”结构,以及旨在以数理构建宇宙模型,而非探讨存在与现象的传统哲学问题。正是因为这一独特的取向,对邵雍的体用论的阐释,突破以往多从其象数学角度切入进行探讨,对邵雍在其象数实践中对体用论的具体运用做出阐释,说明邵雍的体用论是其“观物”哲学的根本方法,为理解现象世界提供了另一视角。

2. “体用”内涵的演变

体用论不仅是邵雍哲学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这一范畴并非邵雍所独创,而是经历了长久的复杂变化。体用概念在先秦已见端倪,经魏晋玄学提炼为本末范畴,又融摄佛教“体用相即”思想,最后形成了丰富的体用思想,也构成了邵雍“体用”思想的理论背景。

有关“体用”的阐释,在宋代已引发了学者的探讨,如晁说之先生(1059~1129)在《儒言》中提到:“究其所自,乃本乎释氏体用事理之学。”王应麟(1223~1296)在《困学纪闻》转述并认同晁说之的观点:“晁景迂曰:体用本乎释氏。”[4]这反映了宋代一部分学者的共识,体用之说源自于佛教。至明末清初,顾炎武(1613~1682)与李颀(1627~1705)则进一步参与了关于体用概念的讨论。顾炎武据典援经,以证体用是中国古代儒典的早有之物的观点。李颀在《二曲集》中提到:“言‘体’言‘用’者固多,然皆就事言事,拈体或不及用,语用则遗失体,初夫尝兼具并称。如内外、本末、形影之不相离,有之实自佛书始。”[5]李颀认为体用二字在古代典籍虽多分别论及,但从未将体用二字并举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二者对举实源自佛教典籍。

中国古代典籍虽记载有体用的概念,但并不是将体用当作对举来看,而是单言体或言用。在这种意义上,先秦时期体用概念并未上升到范畴。体用概念的萌芽直到汉末曹魏之际才开始出现,王弼(227~229)提到:“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6]在这言论中就可以体现出体用概念的对举倾向。这种体用概念特色在于,所谓的“体”,根本上指的是形体本身,而非抽象的本体;所谓的“用”,则既指的是形体所具有的功用,也指的是本体所显现的具体现象。这种以形体与功用之分的体用论称之为“形质论”式的体用论。

自魏晋以来佛教传入并与本土思想相融合,体用便成为了当时讨论的核心范畴。从僧肇、天台智顓等高僧的阐释,到华严宗、禅宗等宗派哲学的成熟,“体用”的内涵与阐释逐渐完善。尽管在不同学派之间体用概念有所差别,但其核心皆强调“体”为抽象本体,“用”为现象。这种佛教影响下严格区分本体与现象为根本特征的体用论,可称之为“本体论”式的体用论。“形质论”式的体用论与“本体论”式的体用论,这也构成了魏晋以来体用论的两种基本形态。

虽然佛教的体用论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的学者承接了自秦汉以来的形体与功用的“形质论”。这种学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对于反佛而言,如范缜(450~515)的《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7]在这里质用就是体用的含义。范缜以体为物的形体,用为事物的功用,正好与佛教的体作为本质,用为作为现象的内涵相反。范缜的质用论与自先秦到汉末曹魏之际以来的体用论相贴合。其二,是体用论主要是应用于易学当中,主要继承自王弼易学的传统,唐代的崔憬以体为形质,用为形质的作用,进一步地丰富了体用思想的内涵。梁山认为:“崔憬建立起形质论与体用概念的相互关联,使得形质论的无体生生哲学变得更加灵活和丰富。”[8]可见,无论是先秦至汉代的体用论,还是范缜的体用(质用)论,都在于以“形质”为体、以“功用”为用,均可归属于“形质论”的体用论传统,而这与佛教的“本体论”式的体用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邵雍的体用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形质”为核心的体用认知在汉唐时期逐步深化,这一时期“体用”范畴与“本末”思想逐渐融合,突破了先秦时期“体用”认知,构建起一个更为清晰的本体与功用之间关系。宋明理学兴起后,二程率先对“体用”概念进行梳理。“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9]其强调将“道”定义为体、“器”界定为用,明确体用的本体与现象之分,同时强调体用之间不可分离,突破汉唐体用认知局限。

二程对体用内涵的解读虽偏离了汉代“形质论”传统,却为邵雍体用论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参照。邵雍的体用论并非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汉代以来的“形质论”思想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创造性的继承与进一步的深化。邵雍体用论与“形质论”二者在根本问题意识上与理论上同出一源。在继承方面,其一,在根本问题意识上邵雍延续了“形质论”以体作为形体,以用作为发用的界定。其二,在理论问题上,邵雍的体用论承接了“形质论”聚焦于分析“物理”的传统。区别于程朱侧重探讨“性理”“天理”等形上本体的“本体论”取向,程颐言:“至微者理也,至善者性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9], p. 430)朱熹亦言:“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如耳听目视,自然如此,是理也。”[10]两者均以天理为核心,强调体用不二的核心思想。邵雍的体用论旨在把握事物的特性。这一致力于分析事物“物理”的取向,既反映了邵雍自身的学问关切之处,也清晰地表明其思想谱系正属于“形质论”传统。

邵雍也拓展了旧有“形质论”传统。一方面,他将体用论从片段式的论述,提升为贯穿其宇宙论、心性论的核心理论基石,使之成为了一套系统;另一方面,邵雍的体用论突破了旧有“形质论”拘泥于单一事物体用关系的局限。他提出了复杂的“体用”互动架构,如“体四用三”的核心架构,以及两物之间彼此“互为体用”的辩证关系,极大地丰富了体用论理论内涵。这一理论创见,在邵雍著作《观物内篇》中有着系统的阐述。

3. 邵雍“体用”与声音之学

邵雍对“体用”的阐释, 正如其在《观物内篇》中: “太阳之体数十, 太阴之体数十二少……柔之用数一百五十二。”^[11]《正音叙录》中内容与上引文《观物内篇》十分类似, 两者间不仅结构类似, 就连具体的数字亦有相同之处。不仅《观物内篇》中太阳、少阳、太刚等之体数分别与《正音叙录》所述的日星金火相吻合, 就连《观物内篇》的用数与《正音叙录》的用数也恰好相对应。这些迹象共同指向, 两者之间应存在本末源流的关系。

邵雍体用论也受到其父亲的影响, 也是对其父邵古声韵之学的创造性转化, 而要实现声韵之学的创造性转化, 就需要从阐释《正音叙录》中的全数、用数等特定概念入手。全数在《正音叙录》中指的是全体之数即日星金火的全部音节之数。邵雍将其借鉴并加以改造, 用体数对应全数, 这里所谓的体数, 即整体之意。用数在《正音叙录》中含义指的是, 天声地音相互应和而形成的音节。可见, 邵雍的体数、用数概念是对其父邵古声音之学的继承与改造。然而, 邵雍并未局限于其父的音韵学框架, 而是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关键性的哲学改造, 将在邵古处只具有单纯声音规律的“全数”“用数”概念提升为具有普遍意涵的哲学范畴。

邵雍通过从邵古等韵学的“全数”与“用数”概念中, 提炼出“体数”与“用数”这一对范畴。在邵古处“全数”“用数”仅仅是用来描述音节结构, 而在邵雍的体系中, “体”被赋予“全体”之义, 指事物的整体存在; “用”则指其中“发显”的能动部分。在邵雍看来, 任何事物既具有发用的部分, 又有静止的部分。“体”是事物静态、不可感知的部分, 而“用”则是其中动态、可感知的部分。二者并非割裂, 而是共同构成事物的统一整体。在邵雍看来, 以体用为视角去解析事物, 能够追溯其功能得以产生的根源, 并揭示其内在结构与活动方式。这种认识结构目的, 在于透过复杂的经验现象世界, 把握事物内在结构与活动规律, 即所谓“物理”。邵雍将这种体用思维模式推广至自然、历史与人文的“观物”实践之中, 在宇宙论等多个领域, 邵雍均以其体用结构作为根本的分析框架, 展现出该认识视角的普遍有效性。邵雍的体用论凸显体用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的特质, 着力彰显形上本体与形下功用的内在贯通性。《观物外篇》中: “太极一也, 不动; 生二, 二则神也。神生数, 数生象, 象生器……器之变复归于神也”^{[11], p. 162}太极是寂然不动本体, “神”即是太极之发用, 体用并非两截, 而是本末一体。这一体用思路与二程“体用同源”同其旨, 但异其途。程颢言: “体用同源, 体用无间, 故善学者求之必自近。”^{[9], p. 1200}二程以天理为本体, 体便是用之原理、用即是体之发用, 中间不以象数作为中介; 邵雍则以太极为本体, 以象数、声音为用, 凸显出体用关系的动态发用特征, 避免了仅从现象层面的简单阐释和囿于形下层面的局限。

4. “体四用三”与“体 - 用 - 不用”

邵雍的“体四用三”之说是对其父邵古的声音之学的改造而来, 邵古的声音之学用于声音规律, 邵雍则将其推广至万物, 李震在《邵雍哲学的体用论》中提到: “在邵雍研究中, 体四用三容易仅仅被置于天地的框架下, 当作天地独有的结构加以讨论, 但其实, 这是一切存在物所共同具有的普遍样态。”^[12]邵雍认为“体四用三”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原理。在邵雍的哲学体系中, “体用”并非脱离实际的空泛概念, 而是一套分析现象世界的精密工具。邵雍认为天地万物间具有“体四用三”“不用者一”的结构, 这种结构体现出邵雍“体用论”作为静态结构分析法所具有的方法论特质。此方法的核心在于, 邵雍通过确定的比例“四分之三”和内在的张力在用与不用之间, 区分出可感知的部分与不可感知的部分, 为复杂的现象世界(“物”)提供了关键的方法论基础。由此, “物为何以此形态存在”这一根本性的形而上学问题, 便在此认知模型下获得了被重新阐释与解答的路径。

邵雍将“体以四分”理解为一切事物存在的普遍结构, 凡是可以四分者, 皆属于“体”的范围。“天之体数四而用者三, 不用者一也; 地之体数四而用者三, 不用者一也。是故无体之一以况自然也, 不用之一以况道也。”([11], p. 51)此“体数四”的表述, 揭示了“体”在结构上是可被析分的本体。“体”既然可以进行析分, 也就表明了“体”不是一个绝对的本体, 而是有形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邵雍的“体”即形体之义。这里的形体指的不仅仅是有形之物, 也包括思想的存在。按照此标准来看, 邵雍所谓的体, 不仅指广延上的存在物“日月星辰”, 也涵盖了时空的“四时四维”, 甚至抽象的存在亦可囊括在物之中, 如“皇帝王伯”对治道的划分。体的含义如此之宽泛, 那么作为“体以四分”的“分”理应也要扩大理解范围。邵雍据此分析方法提出了“天之体数四而用者三, 不用者一也; 地之体数四而用者三, 不用者一也”的论断。这里的“体四”, 并非随意数字, 而是任何事物可被析分出的完整构成, 它源于“太极”的分化。“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四分为八, 八分为十六, 十六分三十二, 三十二分六十四”([11], p. 108)邵雍认为太极首先分化为阴阳, 阴阳交合, 便生出“四象”。因此, “四”作为太极分化出的基本结构, 为万物的生成与划分奠定了根本框架。而“用数三”则是事物构成中的可发用的部分。如《观物外篇》以四种治道方式为体, 但其治道之功(“用”)主要由皇、帝、王来表现。这种方法旨在表明事物之中必有潜存而不发用的部分, 并且为这种关系赋予了一个确定的数字比例(四分之三), 从而使得对万物认识内在结构的分析由经验性转向形式性。

邵雍在“体四用三”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其方法的深刻性并非体现于可发用的部分, 而恰恰在于对那隐匿的“不用之一”的重视。“不用之一”, 在邵雍的体系中, 绝非是“无用”。它是指在“体四”的结构中, 未发用的部分, 它是用的根源性保证。陈睿超指出: “‘存一不用’的思想则蕴含了对于生生不息的世界图景背后之必然性根据的深刻运思。”[13]邵雍通过这套“体-用-不用”的三分结构分析法, 得以更深入地挖掘事物发用的根源所在, 将经验世界全体纳入一个条理井然的结构中。邵雍运用此认知方法分析自然, “四时, 体数也, 三月、三十日, 用数也。体虽具四, 而其一常不用也。”([11], p. 53)将时间纳入到框架之中; 邵雍更将此框架置于经典之中, 提出: “皇帝王伯者, 《易》之体也。”([11], p. 13)邵雍以“体用”作为基本分析框架, 为历史阶段与经典文本赋予了结构性与功能性。

“体四用三”是邵雍体用论作为哲学分析方法的基石。通过预设“体-用-不用”这一具有确定比例的结构模型, 为分析万物提供了形式框架。将“体四用三”理解为一种分析事物静态结构的方法, 正是理解邵雍如何运用其体用论实际地“观物”并建构复杂体系的关键。但需明确的是其静态结构分析属性并不排斥体用动态性, 邵雍“体四用三”凸显体用动态, 与朱熹体用论的静态统一形成鲜明对比。朱熹曾言: “体用同源, 显微无间, 此是切要处。”([10], p. 191)体用统一于“理”, 是侧重体用间的静态关系, 结合“体-用-不用”的象数框架, 也印证了李震所言邵雍体用的独特性。

5. “体用对待”与“互为体用”、“体用非定”

邵雍的体用关系具有双重内涵, 其一, “体四用三”中讨论的是事物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其二, 则是前者的变形, 即“用三”与“不用之一”之间的关系。若不考虑具体的数字关系, 而审视其抽象形式, 那么它体现的就是事物之间的体用相待关系。其中这里“体”对应着“不用之一”, 用则对应于剩下发用的部分。由于不再涉及数字比例时, “体用”范畴作为一对纯粹的分析工具, 在一组事物中, “体”表现为静止的一方, “用”表现为静活动的一方。因此体用关系就从一个诠释事物结构的工具, 上升为被诠释的对象。

如果说“体四用三”为邵雍的“观物”之学提供了分析万物的静态结构方法。那么“体用对待”则为他提供了一个分析万物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提供了切入点。在邵雍的哲学体系中“体”与“用”并不是一个僵化的范畴, “体”与“用”各自对象并不是固定, 在一段关系中表现为体的事物, 在另一段关系中

就表现为用。邵雍将这种思想概括为：“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 ([11], p. 6) 这就意味着，邵雍并不是用一套固定的体用框架去分析事物，而是将体用视为一种动态的、灵活地分析事物的工具。

“体用对待”主要体现为：一方面，“体用对待”体现为“互为体用”的关系，这也就表明分析事物具有变易性。邵雍在其著作中提出：“阳者道之用，阴者道之体。阳用阴，阴用阳。以阳为用则尊阴，以阴为用则尊阳也。” ([11], p. 143) 阴阳虽然是一对基本的范畴，但其体用并不固定。从道的视角来看，阳是道的发显，阴为成体，阴阳二者间互为体用。因此，邵雍“体无定用”的思想实质在于指出：任何一个事物是“体”还是“用”，并非由其自身孤立决定，而是由它与其他事物所构成的特定关系所决定。

另一方面，“体用对待”表现为“体用非定”的动态性状态，这体现出是将“体用”作为一种动态的分析范畴，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这种动态特质与朱熹体用论所秉持“体用不离”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朱熹曾言：“体用元不相离，亦不相杂。” ([10], p. 326) 体则即此理之体，用则即此理之用。其核心凸显出体用之间不可分割且两者间不可混淆的静态属性，这种关联属性与邵雍体用论所具有的动态特质形成了巨大的差异性。按照“体用对待”的分类，邵雍在事物内部之间建立起了一套复杂、精密的体用论，为他提供了观察事物方法。在《观物内篇》中有这样详细的记载，“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目耳鼻口者，万人之用也。” ([11], p. 6) 从万物本身构成而言，其可被感知的属性声色气味是不变的“体”，人的感官是获取这些属性的功能之“用。然而，在具体的认知活动中，体用关系并非僵化。同一个感官如耳朵(用)，既可以聆听音调(体)，也可以辨别节奏(体)。其“体”随情景发生变化，正是世界持续不断运动变化在体用分析中的直接显化。邵雍提出的“体无定用”与“用无定体”，共同构成了一种非固定体用关系。“体无定用”意指事物本身(体)并不必然限定于唯一的发用方式；“用无定体”则指一种特定的作用(用)并非只能依附于某一特定事物。体用之间动态的对应关系，使得邵雍的体用论最终升华为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真正契合并揭示了经验世界的多样性。综上所述，“体用对待”不是一个僵化的工具，而是邵雍“观物”所凭的动态结构分析法。它通过“互为体用”揭示了万物的相对性，通过“体用非定”揭示了万物变易性。从而为其哲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工具。邵雍的体用论，即体现为对传统“形体体用论”与“性体体用论”的扩展，这也正是其对早期理学理论建构的意义之所在。

6. 结语

邵雍体用论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一环，他继承传统哲学中“形质论”体用论，在阐释中又呈现出的自己思想特点。邵雍承接其父邵古声音之学，以“体四用三”“体用对待”等思想作为其体用论的主要架构，它既不同于佛教思想中的体用论，又略区别于自秦汉以来的形质论的体用论传统，通过补充赵恒法提及“体无定用、用无定体”思想的本体论阐释以及李震所强调的邵雍思想的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现有邵雍思想研究的薄弱环节。邵雍的“体用”思想，既促进了理学早期的发展，也为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

邵雍以“体四用三”“体用对待”为核心的体用论，将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与人类认知纳入统一的象数框架，为理学早期宇宙论与本体论的融合开辟了新思路。然而，其过度依赖数字推演的思维方式，把生生不息的现象界强行纳入其先验的数字推演体系，也存在将复杂世界机械化、简化问题的倾向。挖掘邵雍体用论与同时代其他理学家思想的差异，不仅能更全面地呈现理学初创时期的多元格局，也为当代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历史借鉴。

基金项目

本文系贵州省 2024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四大文化工程”研究课题“阳明心学助力良好社会心态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形成的机制研究”课题编号 24GZZD1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张恒. 另一种“体用”: 邵雍藏显义用体论及其定位[J]. 上饶师范学院报, 2023, 43(4): 28-36.
- [2] 赵恒法. 邵雍的体用论[J]. 孝感学院学报, 2009, 29(S1): 110-112.
- [3] 李震. 邵雍体用论的渊源、特色与定位[J]. 中国哲学史, 2020(2): 91-97.
- [4] 王应麟. 困学纪闻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46.
- [5] 李颙. 二曲集[M]. 陈俊民, 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49.
- [6] 王弼. 王弼集校释[M]. 楼宇烈, 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94.
- [7] 范缜. 神灭论[M]. 见僧祐, 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2: 4.
- [8] 梁山. 形质、自然与历史——《观物内篇》的生生哲学[J]. 周易研究, 2025(4): 66-74.
- [9]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王孝鱼, 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200.
- [10]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王星贤, 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91.
- [11] 邵雍. 邵雍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39.
- [12] 李震. 邵雍哲学的体用论[J]. 哲学研究, 2020(9): 59-68.
- [13] 陈睿超. 论邵雍先天易学哲学的体用观念[J]. 哲学动态, 2018(6): 43-50.